

书坊寻古:

一域双书，映照千年司法山河

□许寿辉



书坊人家(张侯辰 摄)

初夏清和，重游建阳书坊。

青山环抱，黛瓦错落，千年古巷的青石板经岁月摩挲，温润莹亮。这里是南国文脉渊藪，更是名扬天下的刻书重镇。数百年墨香氤氲不散，清风穿巷，旧时纸韵依旧萦绕鼻尖。缓步穿行于老街深巷，踏过层层叠叠的旧时光，脚下每一方土地，都曾孕育卷帙浩繁的传世典籍，沉淀下醇厚隽永的闽学风骨。这片方寸古乡，最令人称奇的，当属两部光耀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经典之作：一为宋慈所著《洗冤集录》，确立古代司法勘验的千古准绳；一乃余象斗汇编《廉明公案》，留存民间清正断案的百世声华。

一山一水，涵养两种风骨，一域文脉，写尽千年法理。循着古径探幽，青山静默无言，两部典籍的光影在风中交叠，先贤身影恍若就在眼前。

世人皆知，建阳是宋慈故里。这位41岁才由此出道的“大宋提刑官”，半生奔波于刑狱案牍之间，潜心钻研现场勘验。他笃信“狱事莫重于大辟，大辟莫重于初情”，心怀悲悯，又“审之又审，不敢萌一毫慢易心”，在风雨飘摇的南宋官场坚守本心、探求真相。他不倚权谋、不徇私情，唯以物证为凭，以实操为本，凭一身严谨治学的定力，著成世界首部法医学专著《洗冤集录》。公元1247年，宋理宗“颁行天下，令听讼之官，一遵此书”。遗憾的是，这部首刊于“湖南宪治，示我同寅”的南宋原刻本，却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，无片版存留。如今传世最早的古本，后世所有版本的祖本，正是元代建阳书坊余氏勤有堂刊刻之本。延至明代，建阳已然成为全国闻名的“图书之府”，群贤毕至，万里舟车，《洗冤集录》亦随建本典籍的流转火爆“出圈”，成为各地审案官吏案头的必备之书。

伫立古村旧道，遥想八百年前，59岁的宋慈蹙眉紧锁，正襟危坐在常州“明镜高悬”的公堂上，他时而摇头，时而击节。因为彼时的南宋内忧外患，刑狱积弊深重，“罪无轻重皆送狱，狱无大小悉皆稽留”成为常态。官吏大多缺乏专业司法素养，断案多倚仗口供臆断，凭个人好恶定断是非曲直。宋慈深知，独做的干柴终究有限，仅凭一己之力，既做不了多少，也做不了多久，要护佑苍生，减少冤狱，需要的是火把间的传递。于是他发愤著书，以尸身伤痕为铁证，以勘验流程为标尺，复盘一桩桩生死大案。终于在61岁转任湖南提刑之际，完成了这部光照古今的《洗冤集录》。

全书凝萃着传统司法刚直纯粹的理性风骨。它摒弃人情世故，脱离传奇演绎，只为订立标准，规范流程，辨明真伪。何为自缢，何为勒杀；何为溺水生前之痕，何为死后弃尸之迹。一条条勘验细则，字字珠玑，缜密严谨，为生生死死，守住了一条客观、公正、肃穆的底线，搭建起古代命案审理的科学体系。起底儒生、子承父业的宋慈（父宋巩，曾任广州节度推官），半生辗转仕途，始终坚守“慈于百姓，惠及黎民”的初心，为洗冤伸屈奔走呐喊。他的人生告诉我们：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“法医”，而是一柄以实证为锋、以民本为魂的利剑，铸成了中国古代司法当之无愧的脊梁。《洗冤集录》的价值，也远不止于法医学范畴，更是中华古代法学与法治思想的不朽丰碑。

历史总是伏脉相连。同在这片书坊沃土，三百年后，书坊名家余象斗执笔汇编、刊印《廉明公案》，为千年司法画卷添上一抹温润底色。

余象斗（1560—1637），字仰止，号三台山人。他自幼浸润书海，修习儒典，精研律令，一心奔赴科举，渴望步宋慈后尘，入朝执掌刑名，匡扶正道正义。这份根植心底的礼法理想，伴随他的一生，从未动摇。奈何科场屡屡失意，数次应试皆铩羽而归，执掌公堂、断案安民的满腔抱负无处施展，也成了他毕生的憾事。

仕途无路，初心不改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余象斗弃儒从商，接手家族双峰堂、三台馆两大书坊。他虽投身刻书行业，却与逐利的寻常商贾截然不同。他扎根乡野，观民风、察民情，以笔墨代法槌，以书卷代公堂，化身布衣判官，将无法在朝堂践行的法治理想、

心中的侠气与温情，尽数倾注于笔墨之间。书中收录的乡野讼事，虽无惊天大案的跌宕起伏，却道尽市井百姓的悲欢离合，承载着黎民百姓对公平正义最质朴的向往。

山风穿巷，静坐于“书林门”前的古阶之上，指尖抚过微凉斑驳的砖墙，摊开一册泛黄的《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》，四百余年岁月流转，建本古籍的纸纹依旧清晰，墨色沉静醇厚。身处这片古籍之乡，再读旧卷，早已不是寻常的案头浏览，而是一场跨越时空，与圣贤文脉、与古今司法初心的深情对话，也更加读懂了此书与《洗冤集录》的殊途异趣之妙。

如果说宋慈的文字，面向朝堂百官、聚焦生死重案，是官方司法坚不可摧的技术支柱；余象斗的笔墨，则是面向市井苍生、记录乡土百态，是民间司法直抵人心的人文温度。《廉明公案》《诸司公案》堪称古代民间司法典籍的集大成之作。全书依照大明律例分门别类，囊括人命官司、邻里纷争、婚娶纠葛、财产争端、盗匪奸邪等各类民间常见案件，完整收录诉状、供词、审案流程与最终判词，体例规整完备，俨然一部通俗详实的民间司法卷宗。

两部典籍，初心一脉相承，皆秉持慎刑恤狱的理念，期盼世间再无冤屈。宋慈以勘验之法探求真相，遏制冤假错案；余象斗以公案故事弘扬善念，祈愿世道清明。一居庙堂，一守乡野，一庄雅，一通俗，一冷峻严峻，一温情脉脉，却共同恪守着中华传统司法最本真的信条：明德慎罚，秉公守正。

二者格局境界，又各有千秋，相映成趣。《洗冤集录》崇尚物证与科学，文风冷峻客观，满是极致的理性。面对攸关生死的大案，宋慈踏遍荒郊野岭，细辨尸痕伤痕，深究水火死因，甄别案情虚实。他剥离人情牵绊，凭伤痕定真相，依规程断曲直，让每一桩命案都有据可查，有迹可循。它是古代司法的底气所在，以专业规范约束权力，捍卫法律公正，不让无辜之人蒙冤。

《廉明公案》侧重情理与教化，文风温润鲜活，满载人间烟火。余象斗常年行走阡陌街巷，深谙乡土人情。他笔下的公案无刻意雕琢。清官断案，不靠尸检技艺，亦不固守僵化法条，而是察言观色、洞悉人心，融通伦理、调和乡俗。面对民间细故纷争，官吏以情理权衡法理，以德化解矛盾，止讼息争、和睦乡邻。此书记录的并非司法技艺，而是百姓心中根深蒂固的清官信仰，也让“廉明”二字跳出官样文书，成为基层司法最朴素的价值标尺。

漫步古坊长街，一砖一瓦，皆是千年文脉的回响。

宋慈立身天地之间，勘生、辨真伪，以严谨实证抬高古代司法的专业水准，让律法摆脱主观臆断，走向科学与规范；余象斗游走市井街巷，录善恶、传清风，以通俗故事赋予基层司法人文温度，让律法走出深宫朝堂，走入寻常百姓家。

一部典籍订立司法规矩，杜绝冤滥，守护生死公允；一部典籍传扬世间正道，教化人心，维系乡土安宁。

若无《洗冤集录》的求真精神，司法便失了筋骨，极易沦为徇私妄断；若无《廉明公案》的向善初心，法理便失了温度，终将沦为冰冷教条。回望千年中华传统司法，从来不是单纯的法条裁断，亦非非黑即白的生硬评判。

暮色渐浓，晚风轻拂古巷。

重游书坊，访山水形胜，溯千年文脉，亦叩问司法初心。建阳这片热土，孕育出双壁并耀的法律文脉：宋慈以笔墨为利刃，拨开冤狱迷雾，订立千古勘验规制；余象斗以书卷为明灯，照亮市井人心，传承百世清廉风骨。

一域双书，一刚一柔，求真向善，相得益彰。风起书林，吹动了古巷页脚，也拂过了闽北的连绵竹海，令人心绪澄明。此刻，力透纸背的分明是藏于这片千年山河中的法治密码：斗转星移，司法形制不断迭代更新，但司法护民、清正秉公的内核，历经千年风雨，始终如一。

文化视点

走进武夷山博物馆——

山水之间有斯文

□张侯辰 林水鑫 邱游惠 文/摄

天游峰凌空而起，九曲溪蜿蜒其间，丹崖碧水构成了人们对武夷山最直观的印象。然而走进景区内的武夷山博物馆后，人们很快便会发现，支撑这片山水成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，并不仅仅是风景本身。

与许多体量宏大的博物馆相比，坐落于景区宋街内的武夷山博物馆并不算大，展厅面积有限，但馆内展陈足以展现武夷山的文化地位。

三教名山

中国名山众多，武夷山却有所不同。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，武夷山既是道教洞天福地，又长期受到佛教影响，同时还是朱子理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。儒、释、道三种文化在同一片山水中共存。

一进入博物馆，最吸引参观者注意力的便是一副青铜时代的楠木船棺。船棺木质已经历经千年岁月洗礼，仍然保存大致形态。古越先民就是将这样的棺木安放在绝壁之上的天然岩洞中。站在这样大型的船棺前，让人不禁会去思考，这些沉重的棺木究竟是如何被送上悬崖的？

悬棺的安置方式，考古学界有“架木栈道说”“绳索提升说”“山顶放落说”等不同观点，但至今仍没有统一结论。或许正是这种神秘感，让宗教也青睐武夷山。

早在汉代以前，武夷山便流传着武夷君的传说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道教逐渐兴盛，武夷山因其远离尘嚣、峰峦环抱的自然环境，被视为理想的修炼之地。《云笈七签》将武夷山列为“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”，历代道士纷纷入山结庐修行。道教建筑、宫、观、堂达300多处。

不过，武夷山并非单纯的道教名山。随着佛教东传，越来越多僧侣进入武夷山修行。唐代以



馆内青铜时代的楠木船棺

后，寺院开始在各处山谷间兴建。馆内展板记载，自唐代以来武夷山寺庙遍布，明清以来香火旺盛，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；代表人物有翁藻光、伏虎禅师、袁公禅师、铁华上人、道谦和尚。

不止佛家与道家，儒家文化后来也在武夷山里扎下了根。自南宋以后，武夷山却因朱子逐渐成为理学重镇。于是，三种文化在这里长期共存，相互影响。

武夷书声远

如果说道教和佛教赋予了武夷山神秘而悠远的气质，那么真正让武夷山成为中国文化重镇，则是理学大儒朱熹。在博物馆的二楼，有一片展区，以浮雕的形式，特地复原武夷精舍的大门。

朱熹与武夷山的缘分开始得很早。青年时期，他便频繁往来武夷山。后来，他干脆在五曲隐屏峰下修建武夷精舍，作为读书、著述和讲学之所。馆内陈列的一幅武夷精舍复原图显示，精舍

依山临水，环境十分幽静。远处是层层叠叠的丹霞峰峦，近处则有溪流穿过林间。这样的环境，对于一位治学者而言再合适不过。朱熹友人颍川韩元吉写的《武夷精舍记》记载：“（朱熹）与其门弟子挟书而诵，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词，哦而歌之，潇洒咏味，留必数日。”

最初的武夷精舍规模并不大。朱熹只是希望在山中拥有一处可以安心读书的地方。然而随着他的学术声望日益提高，各地学子纷纷慕名前来求学，武夷精舍逐渐成为理学传播的重要中心。

馆内一张理学传播示意图展现了这理学影响东亚的过程。从武夷山出发，朱子学逐渐传播至全国各地，并进一步影响朝鲜、日本等东亚国家。元代以后，朱子学成为官方推崇的学术体系，而武夷山也因此成为无数读书人心中的文化圣地。

除了武夷精舍之外，寒泉精舍等书院也共同构成了武夷山的书院文化体系。而武夷山也因此成为无数读书人心中的文化圣地。对于这些人而言，武夷山不仅是一处风景优美的隐居之地，更是一座巨大的精神学府。

站在展厅里，人们很容易想象出当年的场景。沿着九曲溪畔的古道，一批批年轻学子背着书箱进入山中。他们来自不同地方，却怀着同样的求知热情。有人在精舍中研读经史，有人在溪边与同窗辩论学问，也有人在夜深人静时借着灯火誊抄书稿。那些回荡于山谷间的读书声，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，却成为武夷山最重要的文化记忆之一。

一叶香千年

博物馆不大，书院置景的旁边便是人们最熟悉的武夷山名片——茶。

武夷山与茶的关系，远比人们想象得更加悠久。早在唐代，武夷茶便已见于文献记载。唐代武夷茶以研膏茶的形式出现，印有飞鹤等图案。北宋武夷山成为北苑龙凤团茶的重要产地。宋徽宗在《大观茶论》说：“本朝之兴，岁修建溪之贡，龙团凤饼，名冠天下”。武夷茶步入皇家官室，享誉于朝廷，驰名天下。

宋朝南渡以后茶事兴旺。诗人陆游赞曰：“建朱熹在隐屏峰下构筑精舍，聚友溪官茶天下绝”。品茗，倡导茶事，并以《茶跋》为题赋诗。斗茶之风盛行，蔡襄撰写《茶录》，宋徽宗著有《大观茶论》，而武夷茶正是当时最受推崇的名茶之一。许多文人雅士在品茶、论茶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美学。对于他们而言，茶不仅是一种饮品，更是一种文化活

动。

明代以后，随着制茶工艺变化，团饼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散茶开始流行。武夷山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。经过长期探索，武夷先民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岩茶制作工艺。采青、萎凋、做青、杀青、揉捻、焙火，每一道工序都需要丰富经验。尤其是做青环节，对制茶师傅的判断能力要求极高。正是在这种不断积累中，武夷岩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“岩韵”。

也是在明代，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，俄国辗转从中国进口茶叶。清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江西与山西茶帮，来到武夷山星村、赤石、下梅设棧收购、建厂制茶。山西帮茶商运载砖茶、布匹等物资到库伦和恰克图参加互市。一条自武夷山直至恰克图的“万里茶道”应运而生。

一只黑釉茶盏静静陈列于展柜中央。盏身不大，造型朴素，但走近细看，釉面内仍能隐约看到细腻纹饰。旁边展板介绍，这是武夷山本地遇林亭窑烧造的茶器。工作人员介绍，遇林亭窑位于武夷山兴田一带，是宋元时期闽北地区重要窑址之一。随着武夷茶业兴盛，制瓷业也随之发展，大量茶盏、茶碗等饮茶器具从这里烧造出来，供应当地及周边地区使用。

在展柜另一侧的图板上，还能看到遇林亭窑出土花鸟类金彩瓷器的纹样复原图。盛开的花卉、展翅的飞鸟以及卷草纹饰被描绘于器物表面，其中部分纹样与唐宋时期武夷茶饼上的飞鹤图案颇有相似之处。它们虽然只是日常饮茶器具，却折射出当时人们对生活审美的追求。茶叶、茶器与茶事共同构成了武夷山独特的人文景观。



梅花纹金彩黑釉盏